

软实力 (SOFT POWER)：它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东西的能力，分为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现这种价值观时）、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软实力与中国梦

ISBN 978-7-5118-1572-9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7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七大上提出，要将提升“软实力”作为国家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为我国“十二五时期”文化的发展繁荣指明了方向。

中国模式 将为亚非拉寻找共同道路提供借鉴

尼泊尔驻华大使坦卡·普拉萨德·卡尔基表示，参观过1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看到了传统文化、经济发展和自然保护的有机结合，这一切都是国家形象的组成部分。通过这些随机的观察，我认为中国大陆城市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的飞跃发展已经可以和发达国家相媲美。

无论“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是否能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经济发展的国家带来实在的政策影响，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未来关于政治经济的学术讨论中一定会加上新的一章。中国模式能够为如何利用国家和市场，并同时消除它们的极端情况提供很好的借鉴。换句话说，中国在国家社会经济力量发展中，协调个体积极性和公共控制的能力已经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认可的软实力。



李希光◇主编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西南政法大学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院长。

我们欢迎中国倡议在全世界开办孔子学院，伊斯兰堡的孔子学院进展顺利。我们欢迎对中国语言和文化学校，以及政治家、议员、商人和文明社会代表们的学习和东方之旅进行投资。中国的饮食一直受欢迎。但下一个世界将是中国企业模式、文化、传统医学甚至电影的混合物。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
马苏德·汗

重新定义中国软实力

过去500年来，现代性来自西方，而今天的现代性来自北京鸟巢、上海世博园、重庆朝天门。重庆故事展现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有经济、私人经济、全球化文化、红色的革命文化多元共存的现代性模式。英国记者、《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作者马丁·雅克说，“很多人仍旧认为，只存在一种现代性模式，那就是西方的现代性模式。”“现代性是由两个因素形成的，一方面是市场竞争、技术，这些可能趋同的因素，会把不同国家带到更相似的发展模式上；另一方面，现代性是由历史、文化所促成的，这些因素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很大，这些因素也潜在影响到社会关系、习俗和制度，不仅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制度，同时也包括经济制度。”

重庆唱红是用最少的投入，重新获取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壮大拥护党和政府的追随者和支持者。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

加强公共外交 提升软实力

中国公共外交的任务很明了，就是向世界说明中国，说明中国的国情，说明中国的政策，回答外国对中国的问题同时了解对方的想法。仅此而已。公众参加之后，中国的话语权就自然增加了。通过公共外交希望国际对中国的事情的了解和实际接近，至于如何评价，那完全是各国的媒体和外国人的自由。



软实力 (SOFT POWER)，它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而非强制的手段从外部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它包括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努力实践这种价值观时）、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及外交政策（当政策符合其利益且具有国际权威时）。

软实力与中国梦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ISBN 7-5118-1112-1
9 787511 811121 >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7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七大会上提出，要将提升“软实力”作为国家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为我国“十二五时期”文化的发展整条指明了方向。



李希光◇主编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建设文化强国”课题组成员，暨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建设文化强国”首席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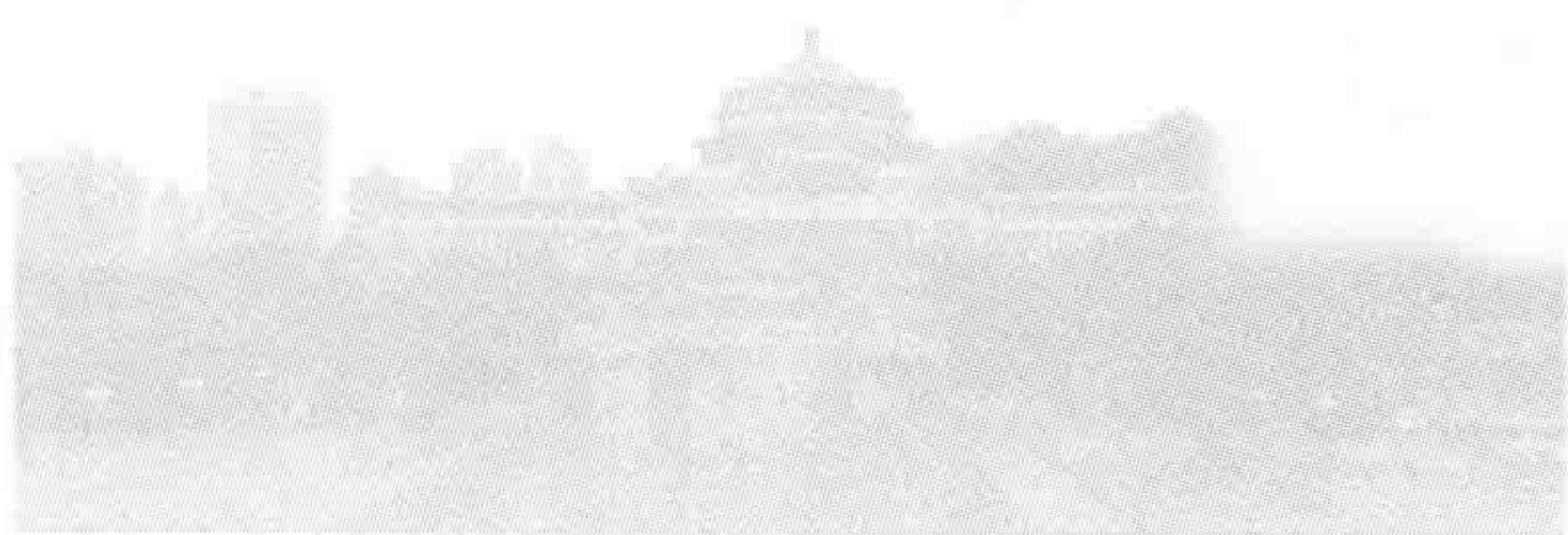
中国模式

将为亚非拉寻找共同道路提供借鉴

软实力与中国梦

李希光◇主编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
马苏德·汗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

加强公共外交 提升软实力

中国公共外交的任务艰巨了。就是向世界说明中国，说明中国的国情，说明中国的发展，说明外国对中国的好感。中国需要了解外方的想法，以此而己。公共外交是双向的。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增加了。通过公共外交，中国可以更好地了解外方的想法。至于如何评价，那要看各国的媒体和外交人的自由。

（新定义中国软实力）

一直以来，现代性来自西方，而今天的现代性来自北京鸟巢。上海世博馆，重庆朝天门，重庆故事展型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有经济，私人经济、全球化文化、红色的革命文化多元共存的现代性模式。美国记者，《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的作者汤米·雅克说，“很多人仍旧认为，只存在一种现代性模式，那就是西方的现代性模式。”“现代性是由两个因素形成的。一方面是市场竞争、技术，这些可通性的因素，会把不同的国家带到更相似的发展模式上；另一方面，现代性是由历史、文化所促成的，这些因素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很大。这些因素也潜在地影响到社会关系、习惯、意识形态方面的制度，同时也包括经济制度。”

现代性就是用最少的人，重新获取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壮大拥护党和政府的追随者和支持者。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软实力与中国梦 / 李希光主编. —2 版.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118 - 1572 - 9

I. ①软… II. ①李… III. ①文化事业—研究—中国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5628 号

软实力与中国梦

李希光 主编

责任编辑 刘文科
装帧设计 汪奇峰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720 × 960 毫米 1/16

版本 2011 年 1 月第 2 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永恒印刷有限公司

印张 24.75 字数 510 千

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编辑统筹 学术·对外出版分社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陶 松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 - 7 - 5118 - 1572 - 9

定价:48.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序 言

创造中国梦 推销软实力*

李希光

飞机冲破浓重的云雾,准备降落在江北机场。我合上沉甸甸的《国家软实力》书稿,朝窗外望去。

位于扬子江和嘉陵江两畔的山城重庆展现在眼前:到处都可看到高耸的吊车、建筑工地。那些已经完工和正在建设中的林立的高楼大厦中的许多楼房是为每年成千上万的农民到城里过新生活准备的。每天有 1200 名来自农村的移民涌进重庆市。

今天,从夜上海到夜重庆,从明亮的北京鸟巢到耀眼的重庆歌剧院,从朝天门到维多利亚湾,重庆正在成为国强民富的“中国梦”示范标本。重庆模式作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嫁接新品牌,为世人描绘了一幅令人憧憬的蓝图,传递了一个一个清新、动人、令人神往的新中国梦——一个精神与物质统一的集合、一个复兴与腾飞的新图景。

20 世纪后半叶,美国通过创造了一个梦想之地,编织了“美国梦”的故事,每天都在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成了世界软实力强国。今天,重庆正在中国成为另一个梦想之地,创造中国的软实力。

一、“重庆梦”:中国模式的标本

中国是一列快速行驶的列车,重庆就是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在这列高速行驶的列车上,乘客复杂,有库区移民,山区穷人,城市“棒棒”,新富人,贫富不均,重庆就是一个中国的缩影。

* 本文是根据作者 2010 年 4 月在重庆市委召开的一次学者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改写的。

“中国政府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中国越是发达，越是繁荣，中国领导层越有一种不安全感 and 受威胁感。”^{〔1〕}2007 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美国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苏珊·舍克教授出版了《中国：一个易碎的超级大国》一书。这是她在书的序言中写的一句话。苏珊在书中还写道，中国 30 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剧烈地改造了中国的社会。从一开始人们普遍认为的一场没有输家的改革，到贫富差距加大，群体事件频发。城乡二元结构对立在加剧，城市居民与农民的收入差距在加大，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省区的贫富差距在加大。这

种二元对立将严重削弱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剑桥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员斯泰芬·哈尔坡在 2010 年出版的新著《北京共识》中写道，“除非北京政权崩溃或者中国政治体制发生激烈变革，中国将永远保持分裂的人格”。^{〔2〕}

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出现的问题：东西部差距加大、内陆城乡贫困、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分化严重。中国发生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问题：腐败成灾、城乡二元对立、贫富差距、环境问题、移民、就业。重庆根据胡锦涛的指示，开始成功地解决“中国双重人格问题”难题。

2007 年，经济危机爆发时，经济学家们预言，依赖沿海外向型经济腾飞的中国经济将一蹶不振。但是，经济危机以来的中国发展超过了大多数人的想象。北京奥运会和世界经济危机后，中国确实崛起了——中国西部的重庆异军突起了。

重庆西部崛起不仅打破了华盛顿共识，也超越了日本与东亚模式，更创新了北京共识。重庆的成功经验打破了西方的定式思维：外资推动论、出口拉动论、廉价劳工论、国进民退论。一时间国际上给重庆模式贴上了各种标签：“一个城市的社会主义”、“一个资本主义人民共和国”、“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社会主义 3.0 版本”……

无论重庆模式被贴上何种标签，重庆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故事是我们思考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新视角和新框架。

长江流经重庆 600 公里，江的两岸是云雾缭绕的大山，重庆东南和东北的两翼更是贫困的大山区。3200 万重庆人生活在这样一片大山里和三峡库区两岸的大城市和小山村里。

1996 年，路透社记者采写的特稿《中国最肮脏的城市处在困难中》写道：“重庆什么生意最兴旺，擦皮鞋的。”其并宣称“重庆不适合人类居住”。

由于重庆 3200 万人口一半以上居住在“大农村”、“大山区”和“大库区”里，重庆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一度达到了 4:1。重庆 40 个区县，有 18 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30 万人绝对贫困。“那些人所在的地方真是人类无法生存的地方”，重庆市的一位官员说。

美国学者苏珊·舍克说，“直到 90 年代中期，中国开展的是一场没有输家的改革，每个人都在富裕。但是中国快速增长的副产品——险恶的社会问题，如贫富不平等、国营医疗制度的崩溃、威胁生命的环境问题等正在激起群众的不满和暴力抗议，这种抗议和不满将会导致

〔1〕 Susan Shirk,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8, p. 5.

〔2〕 Steph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Basics Books, New York, 2010, p. 140.

经济发展短路”。^{〔3〕}重庆学者苏伟说,“是越发展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越稳固、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和尊严指数越高而不是越发展党和国家为人作嫁衣的危险性越高、人民群众的痛苦指数和卑贱指数越高的发展模式”。^{〔4〕}

针对重庆住房、生态、贫困、就业、交通、治安这些极端脆弱处,2008年7月20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了建设“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作为发展的新目标。薄熙来说,“要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不求经济指标长得最快,但求老百姓生活改善最明显;不求高楼大厦盖得最多,但求老百姓过得最幸福”。^{〔5〕}

重庆市有一个“一小时经济圈”计划,政府将把200万农民搬迁到距离市中心只有一个小时车程的开发新区。

“作为中国的缩影,今天的重庆正在为中国,也许是为世界做一项最伟大的试验——让五亿中国农民住进为他们新建的城市。”美国知识界有影响的《国家》杂志不久前在一篇题为《重庆:一个城市的社会主义》的文章中写道,^{〔6〕}“重庆的城市化规模难以令人置信。根据计划,重庆每年要把50万人从农村迁到城市生活。这意味着,重庆必须规划、准备和建设一个亚特兰大城,并为这座城市提供相应的就业、道路、房屋、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

黄奇帆市长说,“如果我们到2020年,常住人口达到70%,户籍人口只涨到了30%,这是共产党的耻辱,我们是无能的政府,二元结构照样存在”。^{〔7〕}

一个生活在中国大城市、月收入只有一千多元的大学毕业生或农民工是不敢想象在一个生活设施良好的居民小区租房安家的。重庆首创了中国公租房制度,让那些经济实力不济的低收入家庭看到了希望。重庆公共租赁住房实行商品房、公租房无差别的“混建”模式,高标准、高品质规划建设。公租房户型面积为35~80平方米,公租房有厨房、卫生间等生活配套,可以保证入住公租房的中低收入阶层,享受到中档商品房的居住标准。

“如果房客是低保对象,租金只是公租房租金的10%,比如,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一个月付500块,低保户只付50元,剩下的由政府补贴”,黄奇帆市长说。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说,“过去干革命,我们党无权无钱,靠搞‘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从而得到群众支持,取得胜利。今天,住房是老百姓最大的民生问题,我们党要赢得民心,就要为老百姓盖房子”。^{〔8〕}

重庆发生了一系列维护人的尊严的故事,故事的中心是人的故事,是关于人的尊严的指数。经济建设的GDP也是民生优先。

〔3〕 Susan Shirk,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8, p. 18.

〔4〕 苏伟:“薄熙来新政与重庆模式”,载 [http://bbs1. people. com. cn/](http://bbs1.people.com.cn/)。

〔5〕 “别样重庆”,载《瞭望》2010年4月20日。

〔6〕 Chongqing: one city socialism, November 2009, Nation.

〔7〕 黄奇帆2010年4月在科学发展观重庆实践座谈会上的发言。

〔8〕 “别样重庆”,载《瞭望》2010年4月20日。

2010年年初,尼泊尔驻华大使卡基来到了重庆。他在重庆调研后说,“我在重庆真正地感受到中国人站起来了。一个贫困潦倒的人是没有尊严的,而重庆故事是一种体现人的尊严的增长新模式。我在重庆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在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夜幕降临,霓虹灯下的重庆看上去像拉斯维加斯一样光彩亮丽,让中国其他的大城市顿时失色。

2009年美国发现频道播出了著名记者泰德·考帕尔摄制的《资本主义的人民共和国》纪录片。该纪录片围绕重庆发生的故事,深入报道了中国的政治、商业和人民。泰德1972年曾随尼克松访华首次走进中国大门。自那以后,泰德总是从一个新鲜的角度报道中国发生的故事。

2008年,他来到重庆,看到了一个让他目瞪口呆的重庆——一个工业化和消费水平蓬勃发展的都市。他在重庆作了大量的采访,人们给他讲的故事让他既受启发,又产生惧怕。重庆拥有3200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但是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听说过重庆。这是一座在人类历史上农民最多的城市,也是人类历史上移民最多的城市。根据市委的规划,将要有上千万农民在未来几年,加入城市化进程,从农村移居城市。近年来的经济危机,特别是美国大公司走向破产,美国失去了大量的工作机会,美国经济元气大伤。而此时此刻,一个中产阶级在重庆这种传统上封闭的山城兴起,在推动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多数西方人没有听说过重庆山城。但是,到过重庆的西方学者和记者都在赞叹:重庆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中美国”命题的发明人尼亚尔·佛戈森去过重庆后写道,“中国没有任何城市能跟重庆的飞速扩张相提并论。我最近来中国访问,看到长江上游的重庆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我早先来中国访问,看到过上海和深圳的建设奇迹。但是,重庆建设速度超出想象。云雾中的重庆上空无数的塔式大楼、盘旋在半山腰的大吊车、流光四射的高速公路、崭新的企业新区让人惊羡不止。我在目睹一场类似早年西方城市里发生的又一场工业革命”。^[9]

作为一个内陆中心城市,重庆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没有受到严重冲击,其外向型经济只占12%。当整个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撞击之下为“保八”艰难奋战时,重庆的GDP以15%左右的增速向前挺进。2010年将达到19%,有可能名列全国第一。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在重庆跨越了意识形态鸿沟,和谐相处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政府治理的手在这里亲密握手了。重庆通过国家看得见的手,创造了投入、资本、购买和就业。重庆出现了一种新市场经济。国企为解决社会和民生问题发展壮大。政府用看得见的救民之手代替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如公租房是完全不收土地出让金的,政府要损失500亿的出让金。公租房是由重庆国有四大国企承建,不收土地出让金,并且成本在十年之内由四大国企内部消化。

[9] Naill Ferguson, *The End of "Chinmerica"*, Standpoint, September, 2008.

“一定要转变一根筋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说,房产具有保障性和商品性的双重属性,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由市场供给的“单轨制”都存在制度设计上的不足。^[10]

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是一直以来的主流观点。但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在重庆找到共融点。一般认为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是对立的,但重庆开创了一些先例,使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携手并进。过去6年,重庆国有资产总值增加了6倍,同时民营经济也是西部12省中最发达的。

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崔之元把“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重庆模式称为“自由社会主义”。美国著名记者泰德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给他拍摄的重庆纪录片起名为《资本主义的人民共和国》。

二、“重庆梦”重新定义中国软实力

(一) 多元的现代性

重庆故事展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普适行为的共同叙事话语。重庆打破了旧有的市场经济的话语体系。

过去500年来,现代性来自西方,而今天的现代性来自北京鸟巢、上海世博园、重庆朝天门。重庆故事展现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有经济、私人经济、全球化文化、红色的革命文化多元共存的现代性模式。英国记者、《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作者马丁·雅克说,“很多人仍旧认为,只存在一种现代性模式,那就是西方的现代性模式”。“现代性是由两个因素形成的,一方面,是市场竞争、技术,这些可能趋同的因素,会把不同国家带到更相似的发展模式上;另一方面,现代性是由历史、文化所促成的,这些因素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很大,这些因素也潜在影响到社会关系、习俗和制度,不仅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制度,同时也包括经济制度。”^[11]

重庆经验为代表的新社会主义力量在探索出一条本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道路,无论你称其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或是“资本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这是一种既扬弃旧社会主义弊端,也扬弃旧资本主义弊端的新社会主义。今天的中国的发展既没有受旧社会主义的制约,也没有受旧资本主义的制约。软实力建设不是从外界给自己找来一件意识形态的外衣,而是像重庆那样实实在在地从国情、省情、市情出发,创建自己的体系,发展自己的观念,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

重庆不仅创新地与世界经济接轨,同时在政治社会发展上试图创新西方模式。重庆的发

[10] “别样重庆”,载《瞭望》2010年4月20日。

[11] “中国崛起,全世界都充满好奇——访《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作者马丁·雅克”,载《文汇报》2010年2月8日版。

展模式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鸿沟。重庆故事并不是西方所理解的中国复制了西方模式,而是两方面的结合。

(二) 国家制度再合法化

挖掘科学发展观在重庆发生的故事,也是在从一个极新的视角讨论国家制度的合法性和再合法化。对于共产党执政的态度,既不要成为西方流行标签和流行意识形态的囚徒,也不要持中国例外论的立场。

西方常常用民主和非民主简单地划分这个世界。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在于这个国家是否搞了选票民主。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凝聚力来自民生改善、国泰民安、经济增长、就业机会、社会安全保障等,来自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否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协商民主,不是选票民主,西方有学者认为,以德治国的政府靠的是以德治国,执政和凝聚力的关键来自党的形象、声誉和口碑。当党的执政面临人民群众不满和公信力危机时,党要不断地营造良好的声誉和口碑,实现执政的再合法化。

重庆的高速发展证明党在现代化建设上的核心领导力。重庆唱红是用最少的投入,重新获取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壮大拥护党和政府的追随者和支持者。放弃为人民服务的红色大旗就会从根本上动摇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对人民群众承担更大的责任。政府要尽量减少人民群众的风险,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要求,不仅是维护经济权利,还要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政府必须有更强的能力保护并且增进公民在安全、人权、福利、就业等方面的权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是国泰民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最重要的保障。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这个职能和权力,它就完全失去了合法性。重庆打黑除恶凸显了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大旗,党执政的合法身份再次获得认同,党的执政实现了再合法化。

当前,对共产党执政最大的不满是腐败和房价。重庆最有新闻价值的故事是打黑、公租房。重庆打黑是在民众的支持和舆论的推动下,以体制内的力量为主来惩治腐败,并通过内部改革和制度创新来建立制约和监督机制,从而达到根除腐败的目的。重庆的打黑行动表明,在现行体制内治理腐败是完全可能的。对于正被腐败困扰着的中国改革来说,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原则意义,关系到中国未来改革的走向。

美国软实力战略的核心是通过美国模式的普适性抢占道德高地。作为中国软实力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必须通过营造自己的发展模式,建设自己的道德高地。没有中国模式,等于中国退出道德高地。重庆模式给国家制度合法性注入新的活力,为在社会多元条件下营造中国的软实力,凝聚人心,进行了探索。

(三)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重庆故事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成功展示,而且具备了中国模式的意义。

2004年,美国学者雷默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意义上的“北京共识”,拉开了世界各地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近年来,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席卷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中国沉着应对,率先实现经济总量回升向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重要进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而在世界舆论中引起了对中国模式更加密集的关注和讨论。学者吴旭说,“这一次全球化解套的过程,也意味着‘美国模式’统领全球的地位正在走向终结。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其模式的溃败和消失,而是指其政经模式本身所具有的创新和带动力出现了衰竭的迹象。人类发展史本来就延续着波浪式逐级推进的过程。而中国的成功也有其历史逻辑的合理必然性”。

3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的选择,成为世界其他国家追随的发展模式。冷战结束后,西方的价值观被《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称为终极的、普适的模式。许多国家开始拥抱西方政治经济模式。但是2007年后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促使人们关注中国模式的崛起,发现中国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导下,通过重庆“市场经济中的人民共和国”这种新型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度过了经济萎缩,而且还享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

30年前,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市场完全自由化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成功了。但是在泰国、菲律宾和印尼,虽然西方的政体在这些国家成功了,但是,经济没有上去,民生倒退了。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承认美国掌握世界的未来权力;承认西方价值的普适性;弱小国家要向西方借钱,必须在政治和经济上屈从西方,如实行经济的私有化和自由化,为西方的利益集团服务。这是一种过时的西方之上情结。中国模式打破了这个范式,中国的成功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选择。华盛顿共识导致很多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如玻利维亚、阿根廷、墨西哥、秘鲁、苏丹、尼日利亚、赞比亚、乌干达、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国。华盛顿共识带来了从食品、能源、交通、水价的物价飞涨、暴力抗议、大学生上街抗议。结果,军警残酷镇压。华盛顿共识失去了合法性和吸引力。

世界上没有一个普适的钥匙能解决所有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如果其不能再保障广大人民的生活幸福,就失去了合法性。重庆的改革不是华盛顿共识所要求的减少公共领域的支出,如减少对社会保障和公共权力的投入,废除政府的补贴。减少政府公共支出、开支,减少政府赤字将会严重影响重庆山区、库区的脱贫和对弱势群体的扶持。世界银行提倡的新自由主义没有实现其设想的经济增长,而重庆实现了。今天解决世界问题不在华盛顿、布鲁塞尔,而正在移到新的经济中心,如北京、上海、重庆。

早期殖民时代,欧洲国家打着启蒙的旗子,到非洲和中国来,推行欧洲模式,但是没有给非洲带来什么好处,更多的是一种经济上的掠夺。同样,50年代的苏联模式也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今天,中国不再躲在别人的模式话语后面求发展,正在开辟一条自己的道路。

弗朗西斯·福山在2009年9月号《中央公论》上的一篇专访(《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中说,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中国今后的民主法

治建设不大可能全盘引进西方理念,而更可能采取立足民生、务实渐进的方式,围绕环境污染、土地征用、基层官员腐败等具体问题,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磨合,逐步实现制度的进步和升级。“历史终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留下一席之地。”

三、在观念市场中推销“中国梦”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欧洲的思想观念和新故事带进了国际观念市场。美国软实力来自美国思想观念和美国人编织的“美国梦”的故事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的软实力来自中国原创的思想观念与中国人编织的“中国梦”在国际观念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的改革开放将把重庆观念、重庆故事和重庆梦带进国际思想观念市场和国际故事市场。

重庆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体系,制定一种新的规则,而这些规则的成功实践,不仅适合中国,有望通过重庆经验与浦东经验、深圳经验等各地的经验有机组合在一起,共同实践并创造“中国梦”。通过深圳、浦东和重庆的经验,人们看到,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自由民主和人权方面不是只有充当西方国家学生的角色。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是西方人眼中的古老的东方国家,有能力通过自己成功的实践来定义价值观,也能成为世界发展新模式、新制度和新标准的制定者和领导者。

“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或“重庆梦”将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经济发展的国家带来实在的政策影响。未来在关于政治经济的学术讨论中会加上新的一章——重庆案例能够为如何利用国家和市场,并同时消除它们的极端情况提供很好的借鉴。重庆在国家社会经济力量发展中,协调个体积极性和公共控制的能力已经成为一种软实力,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超过西方模式的吸引力。中国与世界越来越近,西方与世界越来越远。

20 世纪后半叶,美国创造了一个梦想之地。今天,中国模式和重庆故事将继美国之后成为另一个梦想之地。正如霍普金斯大学讲座教授吴旭写道:“作为一个有着历史责任感的大国,中国需要打造、构筑和推销自己的梦想。‘中国梦’不是自我炫耀,而是中华文明为世界发展前景提供的一个答案。”^[12] 2003 年,巴基斯坦总统穆萨拉夫在北京对中国商界领袖们说,“过去是属于欧洲的,现在是属于美国的,而未来是属于亚洲的。中国过去 20 年来的经济奇迹成为像巴基斯坦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指路灯塔”。^[13]

无论是重庆梦,还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上海浦东开发区早期的建设者赵启正说,“一个国家的梦必须由全体民众的梦组成,脱离了多数人的梦,国家的梦就成了空中楼阁,必然是不

[12] 吴旭:“扭转软实力逆差,打造‘中国梦’”,载《公共外交季刊》2010 年夏季号。

[13] Steph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Basics Books, New York, 2010, p. 243.

能实现的梦”。^{〔14〕}五个重庆编织的美妙世界是每一个重庆人的梦,也是全世界许多人的梦想。这样的重庆梦和中国梦等于中国的软实力,是一种榜样的力量和效仿的力量,应该在国际观念市场占有一席之地。重庆故事和重庆梦是一个能够打破话语障碍、激发共同兴趣的话题。

95年前,16岁的邓小平怀揣着中国梦从朝天门乘船驶向世界。今天的重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又一个新起点,是“重庆梦”为载体的中国软实力走向世界的一个新起点。

2010年6月于重庆

〔14〕 赵启正、约翰·奈斯比特、多丽丝·奈斯比特:《对话中国模式》,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前言

中国软实力发展战略

朱英璜*

一、关于软实力的概念、内涵和核心

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已经为我国学界所接受,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也基本一致。但对于我国软实力的内涵和核心是什么,学者们还是有不同的理解和意见。于是就有过软实力的核心究竟是文化实力还是政治实力之争,有过发展软实力重点是发掘中国的文化资源,还是现阶段加强国家公关,加强我国对外传播能力的不同侧重点的考虑。

(一) 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

党的十七大文件里提的是“发展文化软实力”,据说国务院新闻办近期作了个软实力调研报告也使用的是“文化软实力”。不久前,胡锦涛主席在使节会议上又多次用的是“软实力”。

我个人看法:两种提法在本质和内涵上并无区别。“文化软实力”里的文化无疑应是广义的,并不是仅指文化资源意义上的“文化”,也包括了国家操作层面上的政治软实力,如制度建设、治国理念、内外政策、对内对外的动员能力。

用“文化软实力”的主要原因是认为文化是软实力的实质和核心,是一个国家基于文化的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而形成的思想、道德、制度和政策

* 作者为《中国日报》原总编辑、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高级记者。此文为他在“软实力与政府传播”国际研究会上的总结发言。

力量。据说也有考虑到用了“文化”会显得“软性”些,以免外人又以为是中国要输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了。

我认为这个顾虑大可不必。首先,中国的软实力肯定要输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就如大家谈到的中国发展模式在世界上日益形成的影响。当然这种“输出”是一种自然的吸引力。我们不会要别人都来学中国的,也不想强加于人。我们只是希望世界能够理解和接受中国可以有自己发展道路,有中国人民认可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尽管目前这些都还不成熟,还不完善,还在不断变化和进步中,但这些都应该是与世界“普遍价值”相通的人类文明进步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和责任。

其次,光用“文化软实力”是否会给人一个印象:中国的政治软实力显然是个软肋,少提为好,好像自己就缺乏自信。从世界的反应看,尤其是主导国际舆论的西方媒体的反应看,中国表现在政治上的软实力相对比较弱。不久前,《纽约时报》公布了一个由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和韩国东亚机构所作的调查报告:在亚洲五国加美国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者都尊敬中国文化遗产,但对中国的政治和当代流行文化的影响力却印象较差。过去多次由西方主导的民意调查显示的结果也是如此。西方如此看待中国,其原因是复杂的,无疑有意识形态的成见和战略利益的考虑,有媒体报道的理念和偏见,有民众对中国实际状况的缺乏了解。这就是中国要发展软实力所面临的一个严酷现实——人们可以认可你的文化遗产,但未必认可你现行的政治制度和政策。至少目前的基本状况就是如此,尽管国际上开始有人在认真、客观地看待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也有不少赞誉之词。

因此,我们一方面,是应该重视文化事业的建设,下大工夫去梳理、总结和提炼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资源,这是一项细水长流、潜移默化的工作。另一方面,目前更为紧迫而现实的是应该改善和增强我国在政治上(包括外交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是要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能理解、认同和接受中国的发展理念和道路。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自己走得很好、很稳。

所以,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用“软实力”概念,而不必非把它分为文化的、政治的、媒体的软实力。实际上它们都交织在一起,形成社会科学的一个系统工程,对它的研究涉及了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乃至民族学、心理学等方方面面。目前我们的研究比较多从传播学上展开,其实问题并不仅是传播学上的问题。

(二) 软实力的内涵和核心

大多数学者认为软实力的内涵和核心主要指文化,当然这是广义上的。那么文化传播的是什么?或者说文化中最能对他人产生共鸣、感召力和吸引力的是什么?我认为是价值观。因此也可以说,软实力研究的核心是价值观研究。美国认为它对世界最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并始终自觉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据说英国撒切尔夫人曾经说:“China can never be a superpower. ... China today only exports television sets. Not ideas.”(中国不可能成为超级霸权……中国现在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理念)虽然查不到出处,但这一看法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今天不少发言者也谈到这个问题,如刘康教授所说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危机”,王希教授强调“国家制度和价值观”在软实力中的关键地位,孙哲教授认为软实力建设四个关键因素中主要是“构建软实力价值观,政治体制的革新和改造”。

胡锦涛主席在不久前的使节会议上提出,“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染力”。我理解,这里除了有“硬实力”作为基础之外,主要讲的是政治、文化、道义上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就来自我们的“所想、所说、所作、所为”所体现的价值观是否能为国外民众所理解、接受,甚至赞许。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软实力的研究离不开对价值观的研究。

恰恰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基础性工作要做,有些问题需要回答。

首先,是不是有“中国价值观”一说?其内涵和核心是什么?从传承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它是如何影响今天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和处世方式?它又如何能通过梳理和整合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从现实看,我们说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内涵是什么?中国的价值观又是如何体现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模式、国家制度建设,乃至国民教育和文化建设上?如何代表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道义基础?中国的价值观又应吸收哪些世界文明的成果和精华?这些问题必须弄清楚。正如今天上午赵启正主任所讲的,“首先中国人得把自己的事情弄清楚。自己想清楚了,才能让别人清楚”。

其次,如何看待西方的“普世价值”?如果我们接受,那就可能在接受西方的话语体系而被“西化”。如果不接受,而是排斥和批判,那又如何与西方,乃至许多国家的民众沟通,如何能有共同语言?

中国的价值观与所谓“普世价值”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有学者说,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正处在被西方“战略包围”的局面,如何打破这种包围呢?这些也是我们绕不开的问题。我们可以不接受西方话语权对“普世价值”的异化,更不能接受西方有人拿“普世价值”作为政治工具打压中国,但是,我们提倡和谐世界,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不仅应有共同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基础,同样也应有共同的价值基础。这个问题很值得大家研究探讨。

二、关于中国软实力的现状

一个普遍的看法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的软实力近年有明显的提升,特别是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国发展模式的吸引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但相对于“硬实力”而言,我国的软实力是滞后的,在某些方面还处于弱势。

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我国的软实力在哪些方面是滞后的,弱势弱在什么地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当然原因是很复杂的,有国际的、国内的,有客观的、主观的。在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政治政策环境内,哪些是可以做,必须做,哪些是要加以改进的?

如我国的对外传播能力建设。前一段时间有件事：国家还没有答应拿出所谓的 450 亿支持几家主要对外媒体的发展，外电就纷纷炒作此事，并认定“就是这些钱投进去，中国的媒体在国际上也难有大的作为”。我们可以说这是西方媒体的偏见和“软遏制”，但仔细想想，我们对外媒体的影响力有限，其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呢？现在有领导也认为，看来问题不在“硬件”，而在“软件”。那么“软件”弱在什么地方？我们媒体的公信力和实际对外宣传的效果究竟如何？多年来我们缺少一个独立的，能比较客观地评估对外宣传效果的机构和机制，以至于大家都容易“报喜不报忧”。没有客观的认定，没有对观念和体制上的反思和改进，体现在对外传播能力提升上的软实力也难以改进。郑保卫教授对如何提升我国媒体的对外传播能力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多年来从事外宣的许多同志也努力想改进工作，但为什么我们常常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这值得我们思考。

又如，国家形象，是软实力的具体体现。中国在国际上的真实形象究竟怎么样？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许多学术机构和学者都在做。大家的研究成果在多大程度上被政府和社会所认同？这些研究是否能真实反映实际状况？又如，中国国民通过自己的媒体所看到的中国国际形象为什么与其他国家所看到的不同？这种不同会造成什么内外的后果呢？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仍然负面的为多，研究其原因的文章很多。如何界定这些原因的权重？简单地指责西方媒体的偏见和不公正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呢？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是否就等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如何评估西方民意调查对中国形象的认定？等等问题。许多在座的朋友对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研究，不乏真知灼见。但作为国家，要制定一个合理有效的战略规划，就首先要要把这些问题搞清楚、研究透，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方面政府必须非常乐意地去依靠和利用好我们这些官方的和民间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才智和贡献。

上海交大人人文艺术研究院的刘康和他的同事们开始实施一项国家形象研究项目，建立一个研究国家形象与软实力战略的智库。他们想通过大量以中国学者的研究为主的实证研究，作全球的中国形象调查，建世界主要媒体的中国报道内容分析数据库。找出中国形象的问题所在，中国对外传播的问题所在，这就好比看病先要诊断一样，这也是制定国家软实力发展战略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他们的努力很值得赞赏。复旦大学孟建教授讲述的他们如何作中国城市软实力评估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基础性工作。

三、如何提升中国软实力

大家在发言和讨论中已谈了很多。例如，培育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完善中国发展的理念和模式，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强媒体传播能力建设，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提升中国品牌竞争力，积极推动和用好新媒体，等等。

如何提升软实力其实是个实践性很强的命题，在操作层面上有太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从

政府如何应对境外媒体,到中国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提高;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态势和追求,到我们的导游如何介绍中国;从互联网上相对自由的讨论如何引导和发挥,到政府官员的对外形象和讲话风格……都在体现我国的软实力,都值得我们调研和提出更多建设性的意见。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包括勇于反思、善于总结的精神。就如大家谈到的,近期在新疆事件上,政府面向国际舆论的应对比去年在西藏问题上好得多,更成熟,更有效,但与此同时,我们仍有不少需要反思和总结的地方,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也是我们学界和智库可以做的。

我也很同意有学者提出的,软实力由于其“非强制性”的特点,它的提升绝不是简单地靠包装和推广,要靠“实事求是”,靠“让人家心悦诚服地选择和接受”的效果。切忌搞华而不实,表面热热闹闹,实际没有效果的活动和工程。

四、关于中国软实力发展战略的制定

中国是否有了这样的战略?有战略思考,政府的,学界的,但目前并没有一个系统的指导全局的战略规划。

中国要不要制定这样的一个战略?道理上说很必要。为了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软实力资源,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避免工作上的盲目、浪费和误导。尤其是目前对软实力战略的讨论还是在学术界比较多,而在政府操作层面还似乎缺少一个系统和明确的指导方针、原则和中长期整体规划。

如何制定?现在看来,中央领导十分重视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十七大文件里提到了,而在今年7月份的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主席用了不少篇幅谈中国的软实力。在分析国际环境时,他指出:“国际思想文化领域出现重大动向,软实力之争更加激烈。意识形态等软实力因素在国际竞争和斗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提出外交战线任务时,他把“坚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不断提高我国软实力”作为其中一项任务,要求我们能够“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提升我国软实力”。

因此我想有关部门,一定在思考和制定一个发展中国软实力的战略或规划。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

我认为,要制定这样一个战略规划,国家应整合各方面资源,先做好为制定这一战略所必需的基础性工作,尤其要支持有关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民间智库和专家学者开展调研,提出建议和对策。国家应更加放手,鼓励“解放思想”,要倡导“实事求是”,支持“创新思维”。我们能做的就是发挥民间、学界的资源和才智,为国家各项政策的合理制定和实施,建言献策,实实在在地推动国家软实力的建设。今天清华大学举办的论坛也算是挖掘民间智慧的一种努力。